

# 试论唐代“泾原兵变”的性质

——与彭铁翔同志商榷

陈衍德 杨际平

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卢龙、魏博、成德、淄青四镇联兵反唐。十一月，四镇节度使朱滔、田悦、王武俊和李纳分别称冀王、魏王、赵王和齐王<sup>①</sup>。十二月，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sup>②</sup>，与四王遥相呼应。唐廷以朔方、太原之兵征讨山东，又继之以神策六军，仍屡战不胜。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八月，李希烈兵围襄城，德宗发泾原诸道兵救之。十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将兵五千至京城”<sup>③</sup>，士兵们于长安城东的浚水发动兵变，反攻京城，德宗出奔奉天。乱兵拥立前幽州节度使朱泚为主。数日后，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sup>④</sup>，乃进围奉天，激战月余，奉天几陷。李怀光、李晟等先后率师自山东回援，方解其围。兴元元年（公元784年）三月，李怀光复叛，泾师与之联军反唐，德宗再奔梁州，李晟等几经征战，方于此年六月克复长安，朱泚败死，稍后李怀光亦被杀<sup>⑤</sup>。“泾原兵变”之始末大抵如此。

彭铁翔同志在《唐代建中时期的“泾原兵变”性质考辨》<sup>⑥</sup>一文（以下简称彭文）中提出，“泾原兵变”既非藩镇斗争，亦非镇兵哗变，而是一次具有农民起义性质的军士暴动，并从暴动的原因、参加暴动者的阶级组成、暴动的过程、唐统治者对待这次暴动的态度以及这次暴动的结果等五个方面论证了他的观点。这种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是令人欣赏的。但是，该文所提出的观

点笔者实不敢苟同。现拟从彭文所论的五个方面，提出质疑，以求教于彭铁翔同志和史学界同仁。

第一，从暴动的原因来说，彭文认为，此次事变，“其深刻的根源是这些被迫穿上军装的农民反对频繁战争带来的饥饿、反对无休止的赋税剥削而引起的”。诚然，安史乱后，关陇一带因“吐蕃乘衅，吞噬无厌，迥纡矜功，凭陵亦甚”<sup>⑦</sup>，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一部分边兵的生活亦相当困苦。贞元八年，陆贽上疏言及“今者穷边之地，长镇之兵……常有冻馁之色”<sup>⑧</sup>。建中年间的情况亦大抵如此。建中四年，德宗征调泾师前往襄城，“军士冒雨，寒甚，……诏京兆尹王翊犒师，惟赍食菜饭；众怒，蹴而覆之，因扬言曰：‘吾辈将死于敌，而食且不饱，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sup>⑨</sup>遂鼓譟还趣京师。以此看来，这次事变确有其反饥饿的一面。但是，若以为求温饱者的起事都具有农民起义的性质，则朱滔谋叛时即以“击破马燧以取温饱”<sup>⑩</sup>相号召，岂不更带有“反饥饿”之色彩？从史籍的记载来看，泾原兵变并不是因农民阶级的饥寒而起，而仅仅是出于士兵自身的要求。因而，泾师起事后亦未采取任何积极措施改善农民的生活。

关于赋敛剥削方面，彭文言及“这次暴动发生的原因，正象宰相陆贽<sup>⑪</sup>当时分析的：由于连年‘征师日滋，赋敛日重，……是以叛乱继起，怨讟并兴’，于是上自达官

贵人，下至黎民百姓，大家都担忧必有变故发生，‘旋属泾原叛卒，果如众庶所虞’”。言下之意，陆贄认为泾原兵变实由赋敛日重而起。其实，陆贄的原意只是说，泾原兵变“未必尽关天命”，“致今日之患，皆群臣<sup>⑩</sup>之罪”，此乃针对德宗所言“此亦天命，非由人事”而发。所谓“非常之虞，亿兆同虑”，“上自朝列，下达蒸黎，日夕族党聚谋，咸忧必有变故，旋属泾原叛卒，果如众庶所虞”云云，也都是事后诸葛亮式的话语，借以强调卢杞等人蒙蔽皇上视听之罪，其中不无夸张张惶之词。陆贄谈及田悦、李纳谋叛以来，“征师日滋，赋敛日重”，“刑网稍密，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洶洶靡定”，确也符合事实。在此情况下发生的泾原兵变，亦非偶然。然而他在论及泾原兵变的起因时，却十分笼统，并未言即系“赋敛日重”所致<sup>⑪</sup>。泾师起事前，唐政府对农民的赋敛确实苛重，但起事的泾兵并未采取有如减免农民赋税等措施。泾师入城之际，“百姓狼狽骇走”，有的军士便“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夺汝商货 僦质矣！不税汝间架陌钱矣！’”<sup>⑫</sup>彭文所谓“这次暴动也有明显的反‘赋敛无度’的性质”，其重要根据即在于此。其实，借商是针对商贾，税间架、算除陌虽及于一部分城市（主要是长安）居民，但主要对象仍是商贾，而不是一般农民<sup>⑬</sup>。也就是说，此举与泾原军士及其家属，皆无直接联系。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部分泾兵此语，并非事先深思熟虑之谋画，而是一种策略上的考虑，属于临时应变性质。彭文<sup>⑭</sup>为此口号出自泾兵自身“切肤之痛的感受”，实无根据。以此赋予泾师变乱以反赋敛剥削的性质，实有未允。再看朱泚胁迫司农卿段秀实参加叛乱时，“秀实说之曰：‘公（按：指朱泚）本以忠义著闻天下，今泾军以犒赐不丰，遽有披猖，使乘輿播越。……公宜以此开谕将士，示以祸福。奉迎乘輿，复归宫阙，此莫大之功也！’”

<sup>⑩</sup> 段秀实当时身陷乱兵之中，对此次事变的性质自然十分了解，固不敢任意曲解。可见泾原兵变实因犒赐不丰而起。观泾师起事时，其意即在掠夺琼林、大盈二库，“人言求富”<sup>⑪</sup>；时姚令言尚未参加叛乱，更以“比约东都有厚赏，儿郎勿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图也”<sup>⑫</sup>相劝，凡此种种，都可证明段秀实的分析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比较一下当时其它的藩镇叛乱，亦可证明其“反剥削”是假，邀厚赏是真。如朱滔违勅救田悦时，使其亲信宣言于众：“司徒（按：指朱滔）将发范阳，恩旨令得李惟岳州县即有之，司徒以幽州少丝纆，故与汝曹竭力血战以取深州，冀得其丝纆以宽汝曹赋率，不意国家无信，复以深州与康日知。……今兹南行，乃为汝曹，非自为也”<sup>⑬</sup>。如果必欲言泾师之变带有反赋敛性质，朱滔之叛又当何说？总之，泾师的起事并不体现农民阶级反饥饿、反剥削的要求，充其量只不过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上的考虑，求温饱、邀厚赏而已。

第二，从参加暴动者的阶级组成来看。彭文认为，“泾原暴动之师绝大部分是被迫征募来的农民”，从“参与起事主要群众的阶级内容”来看，此次暴动具有农民起义的性质。这个论断显然不能成立。我们知道，决定一支军队的性质，不在于它的士兵来源，而要看它掌握在哪一个阶级手中、为着什么样的政治目的而作战。如果单从士兵的出身方面来看，则不仅泾师的大部分士兵来自农民，当时唐中央政府和各藩镇的军队，大多数也是来自农民。我们总不能因此论定，上述这些军队都是农民武装吧！那么，泾师起事后，领导权究竟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呢？被泾兵拥立称帝的朱泚，曾任幽州、泾原节度使，“以朱滔叛命，坐夺兵权”，“恒忧愤不得志”<sup>⑭</sup>。其左右手姚令言，曾任泾原节度使，士兵暴动时尚在禁中，闻讯后曾突入乱兵中劝其勿妄动，后来被逼无奈，才参

加起事。李忠臣，曾任检校司空、同平章事，“久失兵柄”；张光晟，曾任太仆卿，“自负其才”，“皆郁郁不得志”。源休，曾奉命出使回纥，回朝后授光禄卿，以“赏薄，怨朝廷”，卒为朱泚谋主<sup>②</sup>。这些人都身居高官，其属于官僚地主阶级自不待言。在这些人的掌握之下，泾师只能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彭文认为，此次暴动虽然是从下层发动的，但“自始至终没有形成与之血肉相联系的领袖和领导骨干”。实际情况又恰恰相反。泾原军士起事后主动拥立朱泚为主，朱泚、姚令言等亦倚泾师邀其政治野心，上下相得，血肉相关，相互为用，其间并无尖锐的阶级对立。如果朱泚、姚令言等与起事军士的政治目标迥然不同，那么二者之间必将出现某种对抗或冲突，然而我们却看不出有这种对立的倾向，泾师中诚然亦有反对朱泚者，如左骁卫将军刘海宾、泾原都虞侯何明礼、孔目官岐灵岳等，段秀实曾“密与之谋诛泚，迎乘舆”<sup>③</sup>。可见，这些人与朱泚、姚令言等的对立亦非农民阶级与地主官僚集团之对立。我们可以这样设问：如果泾原兵变属农民起义性质，那么，这支“农民武装”为什么又非要与朱泚、源休等失意地主官僚结成“联盟”不可？而这种“联盟”（这里权且假设存在这样一种联盟）为什么又如此巩固，如此和谐？凡此种种，彭铁翔同志都未作出，也很难作出必要的回答。

再从泾原军士本身的情况来看，也不是如彭文所说的全是“被迫征募来的农民”。彭文所论，取证于《旧唐书·刘仁轨传》和《资治通鉴·贞元二年》的两条史料<sup>④</sup>，但彭铁翔同志在上述史料的使用上不无可商榷之处。因为前者说的是高宗显庆、麟德年间的兵募，用它来说明建中年间的藩镇兵，显然是不妥的；后者所言则是平时待遇优厚的禁军，在漕运一时不济的情况下发生的叫骂，不可照其字面意义去理解。安史乱后，战乱频仍，

百业凋零，许多破产农民更是把当兵当作一种赡养家火的手段。此时的士兵已与农民相去甚远。建中初黜陟使洪经纶曾罢魏州兵四万人，谓“令归农亩”，田悦激怒士兵们说：“尔等在军旅，各有父母妻子，既为黜陟使所罢，如何得衣食？”结果士兵们大哭不愿离家<sup>⑤</sup>。士兵不愿被遣散归农，说明其经济地位较农民为优。当然，各种士兵的经济状况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且让我们看看泾原军士的状况。泾师的一部分原为西北边疆的四镇、北庭镇兵，安史之乱时“远赴中原之难”，分别进驻过汴、魏、凤翔、怀、绛、鄜等地，而后调至邠州，大历三年在迁往泾州的过程中曾发生过一次未遂的叛乱<sup>⑥</sup>。另一部分是大历八年幽州节度使朱泚遣其弟朱滔率领前来泾州“防秋”的“五千精骑”，以及次年朱泚亲自率领前来的“步骑五千”<sup>⑦</sup>。建中元年，泾师因反对迁徙原州又发动过一次规模不算太大的叛乱<sup>⑧</sup>。诚如彭文所说，这些边兵过着“与豺狼为邻伍，以战斗为嬉游，昼则荷戈而耕，夜则倚烽而视，日有剽害之虑，永无休暇之娱”的军戎生活。但是，还应看到其另一面，即这些来自“百物阜殷”的关东的军士，曾经过着“惯于温饱，狎于欢康”<sup>⑨</sup>的生活，史籍说“泚卒素丰金帛”<sup>⑩</sup>；当年代宗对幽州兵“犒赏之盛，近时未有”<sup>⑪</sup>，即可为证。长安事变发生后，“泾原卒骄，……但守其所掠资货，不肯出战”<sup>⑫</sup>，亦可佐证。这些士兵即使到了边镇，其生活仍有“地著之安”<sup>⑬</sup>，彭文也承认他们是“男耕女织，安居乐业”。可见，泾原军士的经济地位当有别于“衣粮所给，唯止当身，例为妻子所分，常有冻馁之色”的“长镇之兵”，而接近于“衣粮所颁，厚饷数等”的“关东戍卒”<sup>⑭</sup>。泾原军士的这种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反对唐中央的动机只能与唐中叶以来屡见不鲜的镇兵哗变一样，即反迁徙、邀厚赏。只要把泾师的数次变乱与那个时代的一些兵变加以比较，就会更加清楚。

如贞元十三年诏长武兵逃襄州并军委郾相高谏曰：“夏州沙碛之地，无耕蚕业，豳豳移徙，吾所不能”，遂鼓譟，反徙原州时所言“始居邠，甫营耕桑，有地著之安。徙屯泾州，被荆棘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sup>②</sup>是何等相似！又如会昌三年李石率太原之卒赴榆社，“旧例发军，人给二缣。石以支计不足，量减一匠，军人聚怨”，遂军乱逐石<sup>③</sup>。这与泾原兵变中的情景也十分类似。反迁徙，实质是士兵安土重迁，不听调遣；邀厚赏，则是骄兵恣情放纵的必然表现。显然，这与那种在生计断绝的情况下爆发的农民起义毫无共同之处。总之，从泾师领导者的情况来看，这支军队只能成为这些野心家手中的工具；从泾兵本身的情况来看，这支军队也不具备转变成一支农民武装的可能性。

第三，从暴动过程来看。彭文认为，“泾原之师暴动之后，矛头所向是唐王朝及其宗室”。事实亦非如此。起事当日，泾师虽陈于京师之丹凤门外，但仍让德宗出走奉天<sup>④</sup>。如果泾师之变具有农民起义性质，断无让德宗逃逸之理。德宗出走后，泾兵入据含元殿，“大呼曰：‘天子已出，宜人自求富’”，清楚地表明他们仍尊德宗为“天子”，更表明他们起事的目的在于劫财货以求富，并无政治目的。职是之故，他们的第一个行动乃是“争入府库，运金帛”，而非其它。朱泚被拥立为主后，张榜宣称：“泾原将士久处边陲，不闲朝礼，辄入宫阙，致惊乘舆，西出巡幸。太尉已权临六军，应神策军士及文武百官凡有食禄者，悉诣行在，不能往者，即诣本司。……”仍以臣子自居，并无与唐廷决裂之意。有人劝泚称帝，“泚喜，然犹未决”<sup>⑤</sup>。泚称帝后，有人劝其毁唐之陵庙，泚犹言“朕尝北面事唐，岂忍为此！”<sup>⑥</sup>如此等等，都可见其动摇之状。虽然在源休等失意官僚的推动下，朱泚终于称帝改元，设官

分职，翦除唐宗室，与唐廷决裂，但是这种决裂也只是以朱泚为代表的失意官僚和藩镇势力与唐王朝的权力和财富之争，犹如安史以及田悦、李纳辈之所为，谈不上具有阶级对抗的性质。

在起事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彭文认为，“起事群众与人民气息相连，并肩战斗”。实际情况是，泾师夺取府库，“小民因之，亦入宫盗库物”<sup>⑦</sup>，那只是乘乱剽掠而已，在安史之乱时玄宗逃离长安后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sup>⑧</sup>。况且当这些库物既归起事者所有后，百姓仍劫夺不已：“泚自号其宅曰潜龙宫，悉移内库珍货环宝以实之。……无几，百姓剽夺其珍宝，泚不能禁止”<sup>⑨</sup>。可见在人民群众眼里，他们与封建统治者并无区别。实际上，起事者之作为与唐廷亦无不同，对百姓也是任意驱使，多方骚扰：“时伪皇城使李忠臣，每方团练，人心大扰”<sup>⑩</sup>；“取苑中六街大木为冲车，程役苦甚，人不堪。又禁居人夜行，三人以上不得聚饮食，上下惶恐”<sup>⑪</sup>。正因为得不到百姓的支持，故其地盘得不到扩张，“所据惟长安而已”<sup>⑫</sup>，队伍也得不到很大扩充，仅有几股朱泚旧部前来投奔<sup>⑬</sup>，与庞勋起义时那种成千上万的农民群众加入其队伍的盛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不仅如此，百姓还时而举行小规模的反抗，如“时姚令言士马败绩，伤者众，恐百姓乘弊俘之，……皆匿刀箭，夜行昼伏”<sup>⑭</sup>。可见，百姓非但没有与起事者“并肩战斗”，而且对其采取了对抗的态度。其实，彭铁翔同志如果不是把泾原兵变和当时藩镇的一系列事件割裂开来，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出起事者与人民“气息相连”的结论的。泾原兵变是当时唐中央与藩镇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无论是唐人还是后人都未孤立地看待它。如杜牧说：“国家天宝末，燕盗徐起，……未尝五年间不战，生人日委顿，四夷日猖炽，天子因之幸陕、幸汉中，焦焦然七十余年矣，……”<sup>⑮</sup>；王夫之也说：“德宗之初，天下鼎沸，河北连

兵以叛，李希烈横亘于中，朱泚内逼，天子匿于褒汉，……”<sup>⑤</sup>。泾原兵变既无法与当时一连串藩镇叛乱事件割裂开来，也就不可能具有与之截然不同的性质。泾师既是那么一股对抗中央的分裂割据势力，从根本上来说，就与广大人民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之上，从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第四，从唐统治者对待这次暴动的态度来看。彭文认为，唐廷的态度“大大有别于对其他反唐藩镇和叛将”，“阶级本能地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态度”，并以此论断此次暴动是“一次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这也完全不合事实。我们认为，唐廷采取赦诸叛藩而独不赦朱泚等人的态度，一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朱滔、田悦、王武俊和李纳四人虽称王，却是“依周末七雄故事，并建国号为诸侯，用国家正朔”<sup>⑥</sup>，其时众人议曰：“岂得常为叛臣，茫然无主”<sup>⑦</sup>，表明他们仍奉唐室为政治上的共主。李希烈此时亦尚未称帝。而朱泚既称帝改元，遂犯了封建统治者“反易天常，盗窃名器”<sup>⑧</sup>之大忌。唐廷对此自然无姑息之理。二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诸叛藩远在山东，对唐政权并不构成直接威胁，泾师之变起自肘腋，事关唐廷的生死存亡。赦诸藩叛帅而不赦朱泚，既可起分化的作用，使二者不致联合起来，又可集中力量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敌人。至于李怀光，虽然他也逼德宗再奔梁州，但毕竟不如朱泚困奉天之剧，且德宗念他“千里勤王”<sup>⑨</sup>之勋（非此德宗恐已为朱泚所俘），故“曲加容贷”。再者，自安史乱后，唐廷限于财力，即奉行姑息河朔而不容其它地区擅权的政策。会昌三年泽潞刘稹自邀旌节，李德裕即对武宗说：“泽潞国家内地，不同河朔”，“自艰难已来，列圣皆许三镇嗣袭，已成故事”<sup>⑩</sup>。可见，唐廷对藩镇这种区别对待的作法，是前后一致的。总之，唐廷对诸藩与泾师的态度不同，只能说明它与此二者的矛盾有程度的不同，不能说明它与此二者的矛盾有本质

的区别。彭文认为唐廷对朱泚等人“不敢赦”是出自其镇压农民反抗的“阶级本能”，从而断言泾原兵变具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实有牵强附会之嫌。

第五，从暴动的结果来看。彭文认为，暴动“给了唐朝统治者沉重的一击，迫使他们‘赋敛无度’的罪恶行径不得不有所克制，不得不实行一些缓和剥削、发展生产的措施，使社会经济（主要是关陇地区的经济）很快得到一定程度的复苏”，取得了“积极结果”。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泾原兵变被镇压之后，唐政府确实采取了一些蠲免措施，如“其垫陌及税间架、竹、木、茶、漆、榷铁等诸色名目，悉宜停罢。京畿之内……宜特减放今年夏税之丰”<sup>⑪</sup>。能否据此认为唐政府是向农民作了让步，从而赋予泾原兵变以农民起义的性质呢？显然不能。只要看看唐政府每平定一处藩镇叛乱，总要采取类似的蠲免措施，就不辩自明了。如与泾原兵变同时的李怀光叛变被平定后，唐廷下令河中及同州百姓“各给复一年”<sup>⑫</sup>。又如泾师失败后不久，李希烈败亡，德宗亦下诏淮西百姓“给复二年”<sup>⑬</sup>。以其蠲免时间之长，数量之多，岂不更可以说李怀光和李希烈的叛乱也具有农民起义的性质？这显然是说不通的。我们认为，唐政府这种屡见不鲜的蠲免措施，是其安抚百姓，与藩镇争夺民心的手段，而非其它。更何况借商、税间架之类本来只是临时性的应急措施！至于贞元年间关中生产的恢复，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因于泾原兵变，此亦不言自明，兹不赘述。谈到泾原兵变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时，彭文忽视了这么一个事实，即这次事变发生于唐廷与诸叛藩斗争的关键时刻，从而使唐廷在斗争中无法取胜，这样便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力量，助长了地方分裂割据势力，并使得双方的斗争长期延续下去，造成社会的长期动乱不安。而这正是泾原兵变的主要后果。这一后果的消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与推动历史

发展的农民战争，岂能同日而语。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泾原兵变并不缘于农民阶级反饥饿、反剥削的要求；泾师领导者的状况决定了事变的性质只能是藩镇叛乱，其士兵的情况也表明该军不可能转变为农民武装；从事变的过程、唐廷的态度以及事变的后果来看，也不同于农民起义或具有农民起义性质的士兵暴动。总之，泾原兵变是一次具有藩镇叛乱性质的军士哗变，毫无进步性可言。

注释：

- (1) 见《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
- (2) 见同上。
- (3)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
- (4) 同上。次年（兴元元年），朱泚又“更国号曰汉，自号汉元天皇，改元天皇”（《资治通鉴》卷229，兴元元年）。
- (5) 以上分见《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兴元元年，卷230兴元元年，卷231兴元元年。
- (6) 载《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
- (7) 《旧唐书》卷139，陆贽传。
- (8) 同上。
- (9)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
- (10)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
- (11) 时陆贽任翰林学士，而非宰相。彭文此处疏于考证。
- (12) 从“及卢杞为相，……中外失望”，“政事皆决于杞”（《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等记载来看，此处“群臣”当指卢杞等人。
- (13)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
- (14) 同上。
- (15) “时军用既多，不遑远略，户部侍郎赵贽上封事，请税三辅两畿居宇间架，及取两市富商大贾，于西明、慈恩二寺置院检纳”（赵元一：《奉天录》卷1）。
- (16)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
- (17) 同上。
- (18) 《旧唐书》卷127，姚令言传。
- (19)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
- (20) 《唐会要》卷57，翰林学士姜公辅语。
- (21)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
- (22) 同上。
- (23) 《旧唐书·刘仁轨传》：“无钱参逐者，虽

是老弱，推背即来”；《资治通鉴·贞元二年》：“拘吾于军而不给粮，吾罪人也！”

- (25) 《旧唐书》卷127，洪经纶传。
- (26)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三年。
- (27) 《资治通鉴》卷224，大历八年，卷225，大历九年。
- (28)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
- (29) 《旧唐书》卷139，陆贽传。
- (30) 《奉天录》卷3。
- (31) 《资治通鉴》卷225，大历九年。
- (32)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
- (33)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
- (34) 《旧唐书》卷139，陆贽传。陆贽所言为贞元年间的情况，建中年间的情况当不尽相同，如泾师并不象关东戍卒那样“岁月践更”，而是象长镇之兵那样留驻下来。
- (35) 《旧唐书》卷162，韩全义传。
- (36) 《资治通鉴》卷226，建中元年。
- (37) 《旧唐书》卷172，李石传。
- (39)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
- (40) 以上均见《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
- (41)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
- (42) 《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
- (43) “上（按，指玄宗）……出延秋门，……于是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山谷细民争入宫禁及王官第舍，盗取金宝，……又焚左藏大盈库”（《资治通鉴》卷218，至德元年）。
- (44) 《旧唐书》卷200下，朱泚传。
- (45) 《奉天录》卷2。
- (46) 《新唐书》卷225中，朱泚传。
- (47) 《资治通鉴》卷229，建中四年。
- (48) “凤翔、泾原将张庭芝、段诚谏将数千人，……溃归于泚”；“幽州兵救襄城者，闻泚反，突入潼关，归泚于奉天”（《资治通鉴》卷228，建中四年）。
- (49) 《奉天录》卷2。
- (50) 《樊川文集》卷5，罪言。
- (51) 《读通鉴论》卷24，唐德宗。
- (52) 《旧唐书》卷141，田承嗣传附侄悦传。
- (53) 《资治通鉴》卷227，建中三年。
- (54) 《唐大诏令集》卷5，奉天改兴元元年赦。
- (55) 《旧唐书》卷121，李怀光传。
- (56) 《旧唐书》卷174，李德裕传。
- (57) 《唐大诏令集》卷5，奉天改兴元元年赦。
- (58) 《唐大诏令集》卷121，诛李怀光后原有河中将士并招谕淮西诏。
- (59) 《唐大诏令集》卷121，诛李希烈原有淮西将士诏。